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形成與衰落

• 謝 泳

一 西南聯大的設立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與中國抗戰共始終的一所著名大學，由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聯合組成，簡稱西南聯大。西南聯大從1937年平津淪陷後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至抗戰勝利後復員北上（1937年11月1日至1946年7月31日），前後共計九年，為戰時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躍在各個領域^①。

西南聯大不僅培養了楊振寧、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學家，而且也培養了何炳棣、王浩、鄒讜等社會及人文科學家，還養育了像殷海光這樣具有思想家氣質的學者。西南聯大的存在，對分析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活動有重要意義。正如一位西南聯大學生所言^②：

西南聯大便具備了雙重意義。一個是表面的意義，那當然就如其名稱所揭，是一個「學校」，是一座研究學問、傳授知識的最高學府；但在另外卻還有一重不為人們所見的隱潛意義，那就是一個醞釀輿論、領導思想的政治中心。這一面雖然潛隱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卻是西南聯大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意義」。若棄此不顧，只談上課講學，那實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的設立反映了當時國民政府對文化事業的重視，同時也說明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在政府決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南聯大設立的動議直接源於胡適等人，1943年1月2日蔣夢麟在致胡適的一封信中說^③：

弟則欲求聯大之成功，故不惜犧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總覺難免，有時不免痛責兄與雪艇、孟真之創聯大之議。數月前在渝，孟真責我不管聯大事，我說，不管者所以管也。

西南聯大從1937年平津淪陷後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至抗戰勝利後復員北上，前後共計九年，為戰時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西南聯大的存在，對分析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活動有重要意義。

七·七事變前夕，蔣介石邀請了許多國內知名人士在廬山舉行國是談話會，當時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都應邀參加，同時還邀請了大批教授前往，如陳岱孫、浦薛鳳、莊前鼎等。事變後，北方各校紛紛去電告急，要求幾位校長返校應變。當時留在北平的李書華、陸志韋、查良釗、羅隆基、梅貽寶、鄭天挺等21名教育界著名學者、教授聯名致電廬山談話會，要求守土抗戰。同時潘光旦、查良釗等人致電蔣夢麟、胡適、梅貽琦：「就同人觀察，華北局面癥結在地方最高當局對中央尚有疑慮，深恐地方對日決裂後中央反轉妥協退（引者註：原文如此），使地方進退失據。務請向介公進言，對地方作具體表示，俾祛除此種疑慮。」④7月17日梅貽琦電告清華教務長潘光旦「今早重要會議，當局表示堅決，並已有布置」⑤。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政府決定將三校遷往湖南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此事經三位校長回南京和教育部進一步磋商後決定實施。8月14日，教育部密電梅貽琦、顧毓琇：「政府擬在長沙設臨時大學，特組織籌備委員會，敦聘先生為委員……。」⑥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貽琦一封公函說：「奉部長密諭，指定張委員伯苓、梅委員貽琦、蔣委員夢麟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楊委員振聲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秘書主任。」⑦梅貽琦接信後，立即赴長沙進行籌備工作，長沙臨時大學即為西南聯大的前身。1937年12月13日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漢告急。後經蔣夢麟親自請示蔣介石，才決定將長沙臨時大學遷往雲南省會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轉知：奉行政院命令，並經國防最高會議通過，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7月1日正式啟用關防。西南聯大在昆明前後約九年時間。1946年7月，西南聯大返回北方，分別重建清華、北大、南開大學。當時，國人對西南聯大的成功有高度評價，認為這是「民主傳統，寬容精神」的結晶。在國家面臨危亡的歷史時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現出的吃苦耐勞、團結合作精神，實為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楷模。

西南聯大的成功，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一筆精神財富，我們今天迫切需要對聯大精神、聯大風格進行深入研究，以發揚中國知識份子的真精神。張申府在

西南聯大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一筆精神財富，我們今天迫切需要對聯大精神、聯大風格進行深入研究，以發揚中國知識份子的真精神。圖為西南聯大校園。



抗戰即將勝利的時候，曾向政府進言，希望保護大學教授的熱情，他的話也算是對西南聯大精神的一種肯定。他說^⑧：

這幾年來，國人中表現的比較最規矩、最公正、比較最有知識最能感覺、最關懷國家、忍受的苦難也比較最多，最不失為固窮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學教授。今後國家一切改革，總應該對他們多加些重視才是。

二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

所謂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主要指在西南聯大工作過的教授和學生這兩部分人。由於在戰爭環境下，中國的大學教授和學生有較強的流動性，所以我不以在西南聯大的時間長短來界定這個群體，而將所有曾和西南聯大發生過關係的知識份子都算作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所謂關係，是指在西南聯大講過課和曾被西南聯大聘任而未到任的教授。比如胡適，1938年1月20日西南聯大聘其為文學院院長，但他未到任；蕭公權被聘為政治學系教授也未到校；還有1945年10月19日蔣夢麟辭去西南聯大常務委員後，教育部聘任了傅斯年為西南聯大常委，但傅斯年很快就離開了。另外錢穆、羅隆基、熊十力、錢鍾書等只在西南聯大作過短期停留，研究院還聘請過丁聲樹、李方桂為導師，筆者也將其歸為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需要略作說明的是，這個群體並無組織、綱領，也沒有多少聯繫，用群體來將之概括，不過是在抽象的意義上注意到他們價值觀的一致性。以往對於西南聯大貢獻的評價，往往過於重視西南聯大在九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視三校過去的傳統。九年的合作只是結果，那麼它成功的原因在哪裏呢？我認為是由於中國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所致。從1898年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的設立到抗戰期間，制度性的大學已存在了近40年。1904年京師大學堂派出第一批47人留學生，其中31人留日，16人留西洋^⑨，作為制度性的大學留學制度已初步完成。清華大學的前身遊美學務處成立於1909年，比京師大學堂晚出15年，作為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學校，完全是為留美學生而辦的，到1925年國立清華大學正式成立。南開大學從1904年建立中學到1919年成立大學，時間比北大、清華稍晚，但大體在同一時期。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說，雖然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教育在中國起步較晚，但到抗戰前夕，不到40年的時間內，已經初步形成了可與世界著名學府相比的現代意義的大學教育體制，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個奇迹^⑩。西南聯大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是抗戰爆發的特殊歷史條件，將當時中國最優秀的三所大學匯聚在一處，形成了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

我們觀察西南聯大三位常委的年齡結構和教育背景：

西南聯大三位常委的年齡結構和教育背景

姓名	生卒年	早年教育背景	留學國家	聯大時年齡
蔣夢麟	1886-1964	上海南洋公學	美國	51
梅貽琦	1889-1962	南開學堂	美國	54
張伯苓	1876-1951	北洋水師學堂	考察日本教育	61

以往對於西南聯大貢獻的評價，往往過於重視西南聯大在九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視三校過去的傳統。九年的合作只是結果，那麼它成功的原因在哪裏呢？我認為是由於中國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所致。

西南聯大的教授中以出身清華的較多，這意味着它的美國化程度。以1909-1929年清華留美學生為例，在這期間幾乎每一年的留美學生都有成為西南聯大教授的。

從三位校長的年齡上看，他們基本上是十九世紀末出生的人，大致比北大、清華、南開初創的時間早15年左右，這決定了他們的小學和中學教育是傳統的，而大學教育則是現代的。梅、蔣留美的教育背景大體代表這一代知識份子的一般狀況，而他們前代的知識份子即梁啟超那一代的教育背景則以留學日本為基本特徵。中國現代意義上大學的建立，與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形成基本是同步的。如果沒有抗戰，這個群體依然會存在，只不過沒有像現在西南聯大那樣密切合作而已。指出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形成是想說明：中國在二十世紀初進入現代化起步階段，本來有一個良好的開端，然而這個過程太短了，從清華1909年首次制度性派學生赴美國留學到抗戰爆發，這期間有兩代知識份子比較活躍，即十九世紀末出生的那一代人（以胡適、傅斯年為代表）和二十世紀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錢鍾書、費孝通為代表）。本世紀30年代前受過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幾乎全部回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社會結構尚比較適合他們生存，這批人除少數在政府做官外，絕大多數成為大學教授。抗戰爆發時，這兩代知識份子中年長的在50歲左右，更有像錢鍾書、華羅庚、陳省身這樣剛剛學成歸來的少壯教授，他們的年齡不過30歲。西南聯大的教授中以出身清華的較多，這意味着它的美國化程度。以1909-1929年清華留美學生為例，在這期間幾乎每一年的留美學生都有成為西南聯大教授的。1909年梅貽琦，1910年胡適、趙元任，1914年金岳霖，1915年袁復禮，1916年吳宓、陳達、燕樹棠，1917年查良釗、湯用彤，1918年劉崇鋁、葉企孫，1919年錢端升，1920年曾昭倫、蕭公權，1921年浦薛鳳、李繼侗，1922年聞一多、羅隆基、潘光旦、吳澤霖、雷海宗，1923年顧毓琇、施嘉煬、吳景超，1925年湯佩松、李輯祥、莊前鼎、劉晉年，1926年任之恭、陶葆楷、賀麟，1927年柳無忌、丁佶，1928年陳之邁、趙詔熊，1929年張蔭麟、王贛愚、沈有鼎、楊業治^①。從這個統計中可以看出，除初期1911、1912、1913三個年度外，在近20年的時間內每個年度都有留美的學生成為西南聯大的教授，而且人數越往後越多。通過以上觀察，我們大致可以說西南聯大的知識份子群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一個縮影，抗戰前中國第一流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學者主要都集中在西南聯大。

三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特點

從年齡結構上看，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年齡下限約為1920年，也就是說，1920年前後出生的人是西南聯大的最後一批學生，這個年齡段大致可以將1945年考入大學的學生包括在內。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由教授和學生兩部分人組成，本文主要分析教授群體，而學生群體則有另文專述。教授中年齡較大的是梅貽琦、張伯苓、陳寅恪、劉文典那一代知識份子，年齡較輕的是錢鍾書、費孝通、陳省身、華羅庚這一批1910年前後出生的人。從教育背景上考察，陳寅恪那一代知識份子多數帶有遺民色彩，他們受的是完整的傳統教育，但同時又有留學歐美的經歷。錢鍾書這一代知識份子多數也受傳統教育，但其深度與前一代有了距離，總體

上說，他們可算是中國傳統教育的最後一批受惠者，加上接受比較完整的現代大學教育，當中許多人都成為中國新的人文學科的創始人。陳寅恪、劉文典那一代知識份子雖然已經使用西方的方法來治傳統的中國學問，但從學科的角度看，他們多數是在研究中國的文學、歷史、哲學。而從錢鍾書、李景漢、潘光旦那一代知識份子之後，中國的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教育學等新的學科才逐步建立和成熟起來，在自然科學方面，新的學科也是在1910年前後出生的那一代知識份子中成熟起來的。西南聯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她的教授多數留學美國。1945年西南聯大將北上復員時，由西南聯大學生編過一本《聯大八年》的紀念冊，這本紀念冊的第四部分「聯大教授」的前言中有一個統計：「聯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歐陸，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學。三位常委，兩位留美，一位未留學。5位院長，全為美國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國文學系及兩位留歐陸，3位留英外，皆為留美。」^②這個統計充分說明西南聯大帶有極強的西方色彩，特別是她的教育思想和課程設計，主要受美國自由教育思想的影響。在西南聯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兼容並包，已成為公認的價值標準。我們注意西南聯大的貢獻，不僅在於她為戰時及後來的中國培養了許多專業人才，更在於她的融會東西文化的優長，為中國現代化進程提供了一個範例。如果中國社會有較長時間的穩定，西方文化是可以在中國的大學環境中生根的。1947年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在國共調停失敗後，曾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中國政治中所應有的地位寄以厚望，在他離華前發表的聲明中曾預言：「此種問題之解決，自余視之，須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份子獲得領導權，此種人物頗為優秀，唯無政治權力以運用其控制力量。」^③馬歇爾的這種評價直接源於他與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的接觸和了解，他的期望是極富遠見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說^④：

我們在中國培養自由主義已有百年之久。我們的傳教士曾帶去個人價值的信息。中國官員曾研究我們盎格魯—撒克遜式的制度。中國教育、新聞、銀行、工業等方面的領袖人物曾學習我們的榜樣。我們所知的近代中國，就是由那些借鑒我們經驗的人建立起來。

1942年費正清訪問西南聯大後，對這裏的教授作出如下評價：「這些曾在美國接受訓練的中國知識份子，其思想、言行、講學都採取與我們一致的方式和內容，他們構成了一項可觸知的美國在華權益。」^⑤作為戰時美國的外交官，費正清希望美國政府能對「美國培養的昆明清華大學教授」給予援助，因為他們是「美國在華的一種投資和財富」^⑥。在昆明時，費正清與陳福田、張奚若、錢端升等12位教授進行了交談，認為他們是「中國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學術界人士中間的精英」^⑦。費正清雖然是從美國在華的利益來觀察西南聯大教授的，但他對這批教授的整體評價，符合當時的情況。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另一個特點是，雖然他們多數有留學歐美的經歷，但在倫理道德層面卻明顯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可以說在專業和政治意識上傾向西方，而在生活的層面上還是中國化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雖然多數有留學歐美的經歷，但在倫理道德層面卻明顯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可以說在專業和政治意識上傾向西方，而在生活的層面上還是中國化的。這個特徵使他們成為當時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領袖。

的。這個特徵使他們成為當時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領袖。任之恭回憶當年的經歷時寫下了這樣的話^⑩：

首先，戰爭時期為保存高等教育而奮鬥的主要動機來自於中國傳統的對學識的尊重，在以儒家為主的傳統中，中國學者被認為是社會中的道德領袖，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精神領袖，那麼，從這一觀點出發，戰時大學代表着保存知識，不僅是「書本知識」，而且也是國家道德和精神價值的體現。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是承擔了這種責任的。1941年國難當頭，國家經濟異常困難，當時教育部規定，凡擔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發給一筆「特別辦公費」，但西南聯大的各院負責人不願因此而引起廣大教授不滿，聯名上書校方指出：「抗戰以來，從事教育者無不艱苦備嘗……十儒九丐，薪水尤低於輿臺，……故雖啼饑號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⑪表示拒絕領受這項特別補助，從中不難看出他們身上深重的中國文化影響。王浩說：「我覺當時聯大有相當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備了中西文化的優點，彼此有一種暗合視為當然的價值標準。」^⑫

四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生存空間

1949年以前，大學教授的經濟地位是較高的。當時教授的收入為300-400元，最高可達到500元，是工人工資的20倍，這種差距是有其合理性的。因為經濟地位的確立使大學教授的自由流動成為可能，同時也激發他們鑽研學問的熱情。

1949年前，對中國的大學教授而言，曾經有過一個較為寬闊的自由生活空間。國民政府雖然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做過種種限制，但作為教授生活的幾個基本條件並未喪失。首先教授享有自由流動的權利，其次有思想自由、學術自由。

所謂自由流動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這裏主要指當時大學教授的主動選擇。它包括：一，遷徙的自由（在國內外自由選擇居住地的權利）；二，擇業的自由（在國內外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這兩種選擇完全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不受任何限制。從歷史資料看，大學教授的這兩種權利是得到基本保障的。我統計過北大、清華、南開、北師大在1949年前的一百位教授的自由流動情況，他們當中平均自由流動三次，多的則達四五次。

自由流動的權利並非大學教授所獨有，我們之所以特別強調這個基本權利對大學教授的重要性是因為：大學教授作為知識份子，在其謀生之外有關懷社會價值的天然傾向，就是說，他們在謀生過程中同時承擔許多道義上的責任。他們通過寫文章、辦報紙刊物、自由選擇黨派、隨意批評政府等行為來體現自己的存在，這些特徵決定了大學教授是一個自主性極強的群體，其生存環境也就具有相對的多變性。與其他階層相比，他們較難在一個固定的環境中長期生活下去，這時候自由流動就成為他們生存的基本保證。一般人以為大學教授很難合作，但這只是刻板的道德評價，由於這個群體具有較強的專業特徵，他們傾向追求志趣、見識、水平的一致，所以選擇性也就較強，產生的矛盾亦較多。但自由流動的權利使他們能在矛盾激化以前便主動作出選擇、迴避。

自由流動本是憲法中遷徙自由的具體化，它的實現與大學教授的經濟地位直接相關。1949年以前，大學教授的經濟地位是較高的，我們從清華梅貽琦就任校長後的一項規定就可看出。當時教授的收入為300-400元，最高可達到500元，而且每位教授還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講師的工資為120-200元，助教為80-140元，一般職員30-100元，工人9-25元^②。很顯然，教授工資(以最高為限)是工人的20倍，我們如果不以階級的觀點，而從管理本身來看，這種差距是有其合理性的，因為經濟地位的確立使自由流動成為可能，同時也激發了大學教授鑽研學問的熱情，它亦使每一位大學教授能在不斷的流動中找到自己最佳的工作環境。在這樣的過程中，從精神到物質，他們總能較長時間地保持最佳狀態，多數人自覺固定下來的大學，通常是最心滿意足的。對大學來說，自由流動的結果是將磨擦和矛盾減到最低程度，同時最大限度地保持教授間的平靜與和諧，而自由流動又不斷打破這平靜與和諧，在流動中始終保持活力。

在30年代，對大學教授而言，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最終體現在自己的思想和學術成果能否以出版的形式被傳播。西南聯大時期，集中體現這種權利的是教授的任何學術活動都不受政府干涉，在教授中先後辦有《當代評論》、《今日評論》、《戰國策》這樣政治傾向明顯不同的時評周刊。對當時的學生來說，他們享受了結社和出版的自由，在校園內以各種形式的壁報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形成了一個較為活躍的思想空間。在整個抗戰期間，西南聯大作為自由精神的堡壘，自覺地抵制了國民黨試圖加給學校的思想控制。這種來源於西方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念影響了西南聯大的學生，直到今天，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中，依然能見到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活動的身影。殷海光晚年談到自己的人生經歷，認為主要「受五四的影響和五四後期的西南聯大的熏育」^③。他在西南聯大時，受到金岳霖的賞識，這對他一生的思想具有決定作用。「他不僅是一位教邏輯和英國經驗論的教授而已，並且是一個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份子。昆明七年的教誨，嚴峻的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吸，現在回想起來實在鑄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④王浩認為，對當時西南聯大自由民主的學風，只有身臨其境的人才有最親切的感覺，因為那裏不論年資權位、教師與教師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師生之間，可以說「誰也不怕誰。當然每個成員因為品格和學識不等，會受到別人的尊重或輕視，也有些人為了個人的複雜心理，作事對人不公正。但是大體上開誠布公多於陰謀詭計，做人和做學問的風氣都是好的」^⑤。余英時論錢穆時曾說：「他承認3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已醞釀出一種客觀的標準，可惜為戰爭所毀，至今未能恢復。」^⑥實際上在西南聯大時期，這個「客觀的標準」還是存在的，真正的消失是在1949年以後。

西南聯大時期，教授的任何學術活動都不受政府干涉，在教授中先後辦有《當代評論》、《今日評論》、《戰國策》這樣政治傾向明顯不同的時評周刊。對學生來說，他們亦享受了結社和出版的自由，在校園內以各種形式的壁報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形成了一個較為活躍的思想空間。

五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精神狀態

《觀察》是一個政論周刊，它的編者儲安平是復旦大學教授，這一特點，決定了這個刊物的基本作者隊伍。在《觀察》上發表主要文章的人，可以說都是當

時中國各著名大學的教授。在《觀察》封面上列名的78位「撰稿人」中，有26位是西南聯大教授，約佔三分之一。她的實際作者還要超過這個比例^②。

在當時的中國，教授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我們不能把它視作一個階層或階級，而應當把它視為一個在經濟上相對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專業上有固定方向的群體。這個群體帶有西方中產階級的性質，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知識份子的一部分。我在這裏強調他們作為大學教授，而沒有籠統地以知識份子相稱，那是因為在整個知識份子和各類人群中，大學教授最能獨立表達自己的思想，很少受制於黨派利益制約。雖然當時在大學任教的教授有相當一批人分屬於民盟、國社黨、青年黨等政治團體，但他們在論政的時候，多以個人身分發言。張東蓀就多次說過：「本人向來在政治上苟有主張，總是獨往獨來，所以雖隸屬於民盟，而所說的話卻是不代表民盟，讀者千萬不要誤會。」^③張東蓀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時，每次校務會議上都要恭讀總理遺囑，他對此很不高興，遂奪門而出，並聲言：「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可見張東蓀的個性^④。曾經有一段時間，國民黨為了加強對西南聯大的控制，要求聯大的所有負責人都加入國民黨，時任法商學院院長的陳序經聽了就敢說：「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⑤張奚若有一次參加國民參政會，他發言批評國民黨的腐敗和蔣介石的獨裁，被蔣介石打斷說：「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張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下次開會時，他接到寄來的通知和路費，當即回一電報：「無政可參，路費退回。」從此再不參加國民參政會了^⑥。

國民黨曾要求聯大的所有負責人都加入國民黨，時任法商學院院長的陳序經聽了就敢說：「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張奚若接到寄來參加國民參政會的通知和路費，他回一電報：「無政可參，路費退回。」這都說明了當時的大學教授在骨子裏是有真精神的。

我這裏着重介紹40年代大學教授的精神狀態，是想說明當時的大學教授在骨子裏是有真精神的，這種精神在抗戰勝利後曾一度高漲，只是在1949年以後才減弱。這裏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在1949年以前，政治上的嚴酷並沒有到不准民間報刊生存的地步；第二，大學教授在經濟上相對有保障；第三，大學教授有遷徙的自由、擇業的自由、選擇加入任何一個黨派的自由、在政治上有闡述自己觀點的自由。抗戰八年，大學教授的整個精神狀態足以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的楷模，西南聯大為典型代表。

1946年7月，西南聯大返回北方，分別重建清華、北大、南開大學。《觀察》對西南聯大在抗戰中的表現給予了高度評價，在一篇很長的通訊中，它將西南聯大的精神概括為：「民主傳統，寬容精神。」作為一個以大學教授為主要作者的刊物，《觀察》對校園生活所表現出的興趣表明，在中國，大學是一塊集中了新思想、有獨立精神的地方；相對中國社會的其他角落，這裏有更多的民主傳統、寬容精神，更為重要的是它肩負了領導青年思想的重任。儲安平辦《觀察》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希望給國家多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這包括兩方面：首先是在學識上要有西方的精神，其次在做人做事上既要有思想的力量，也要有道德和修養。正是出於這樣的理想，《觀察》對大學教授和學生的生活從始至終給予關注，從思想活動到生活就業等問題都有及時的反映。《觀察》對西南聯大的精神推崇備至，這不僅完全符合儲安平一貫信奉的自由主義理想，更主要的是，大學教授在國家面臨危亡的時刻所表現的吃苦、忍耐品格和理想主義精神，在西南聯大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這是自由主義精神結出的美麗花朵。

在整個抗戰期間，以「聯合」為名的大學為數不少，但大多是聯而不合，不

到幾年便不歡而散了，只有由北大、清華、南開組成的西南聯大，能維持九年之久，而三校更在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並奠定了長期合作的基礎。《觀察》認為，西南聯大的成功「不能不歸功於教授先生的高超德行，三校傳統上的寬容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長」^⑩。而這一切都與西南聯大教授的整個教育背景有關，他們多數是出於清華、北大而留學歐美又紮根於母校之中的，這是自由主義精神的成功典範。《觀察》對西南聯大的成功有非常詳細的分析，我們不妨敘述如下。

有派系而無派系之爭。在一般的學校中，不斷地鬧派系之爭，但這種情形卻很少在西南聯大發生。這並不是說西南聯大沒有派系。在聯大，正如在任何學校一樣，教授們因政治、思想、年齡、工作、學科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團體，但這些派系都不在學校行政上有甚麼爭奪。因為聯大的教授大都是學有專長，他們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沒有空閒去管學校行政，因此就更不會有甚麼派別之爭了。當然，凡是學校行政上發生了甚麼錯誤，總會有人作坦白的批評，務必做到錯誤被糾正過來。由於他們的學問與人格，彼此的意見雖有不同，但總是為了學術的緣故而相互合作。

容忍和民主造成和諧。他們所以能在一起合作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的寬容精神，是聯大這座被稱為「民主堡壘」或「自由堡壘」的「中心」精神。因為如果沒有容忍精神，則少數不肯服從多數，多數不肯尊重少數，那就只有黨爭和暴政而不會有民主與自由。北大、清華、南開都以寬容精神見稱。例如蔡元培先生出掌北大期間，教授群中可以有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國民黨人等革命份子、也有保皇份子，正因有這種容忍精神才能夠「教授治校」。例如清華，重要的問題都由評議會決定，而評議會則有過半數的評議員是由教授選舉出來的。只有實行容忍的精神，才能使三校聯合九年而合作無間。

各黨各派，兼收並蓄。聯大容忍精神的最佳表現，就是它包容了各黨各派的教授與學生，雖然不能完全指出誰是那一黨那一派，但在聯大校園內，就有共產黨、第三黨、民主同盟、民主社會黨、中立派、國民黨、三青團和國家主義等黨派的教授與學生。教授方面：在屬於左派政黨的教授中，有聞一多和曾昭掄等先生；屬於民主社會黨的有潘光旦和費孝通等先生；沒有黨派而批評政府的有張奚若和陳序經等先生；比較中立而對政府常有意見的有陳岱孫和王贛愚等先生；屬於國民黨反對派的有錢端升等先生；屬於國民黨批評派的有周炳琳、楊振聲等先生；國民黨開明份子有馮友蘭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團的姚從吾和陳雪屏等先生……。在這許多教授中，有一可喜的事，就是沒有頑固派份子。不過如果有極左或極右的人，聯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正因如此，才可以使許多人在一起而沒有糾紛^⑪。

此外，考察大學教授對學潮的看法，是了解他們精神狀態的另一重要標誌。西南聯大教授對學潮不僅採取同情和理解的態度，而且敢於公開表達對政府鎮壓學潮的不滿情緒。他們通常是先在校園內勸阻學生；其次是以宣言、文章等形式奉勸政府理解學生的行為，改善自己的統治。在學潮勢不可擋的時候，他們有部分人甚至參與學生的遊行行列。我們如果留意教授在學潮中的表現就會發覺，他們對自己的行為沒有甚麼恐懼感，總是敢於路見不平，以言相

西南聯大教授對學潮不僅採取同情和理解的態度，而且敢於公開表達對政府鎮壓學潮的不滿情緒。在40年代，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他們在公眾心目中代表着公正和良知。

助的。在對學生的態度中，他們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講的都是真心話和心裏話。他們的整個精神處於一種蓬勃向上的狀態。他們雖然有自己遠離政治的專業，但對國家的前途同樣抱有強烈的責任感，而且他們有說話的權利。當時由於有民間報刊這一主要言論渠道，所以教授對時政的所有看法都能及時傳達出去；另外整個大學之間對於教授的評聘有較為嚴格的學術標準，這使獲得教授資格的學者具有充足的自信來呼籲公正、主持正義。在40年代，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他們在公眾心目中代表着公正和良知。他們當時最大的特點是在批評和抗議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體力量，絕不是個別獨立地去抗爭，而是團結一致。那時的大學教授，只要覺得政府作出的決定不合理，馬上就可以聯名發表宣言表示抗議。西南聯大時期，大學教授聯名簽署的聲明、宣言有四個非常明顯的特點：第一，以西方的法制為立論的基本前提；第二，一切以公眾利益為最高原則；第三，一切為國家走上健康的民主政治之途努力；第四，他們所關心的問題決不圍繞個人，而是以公理為尺度。

六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衰落

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從1949年後開始衰落。他們在這一巨大的歷史轉折關頭多選擇留在大陸，這種選擇與他們曾經擁有的價值觀念之間出現了巨大差距，這是困擾許多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者的問題。本世紀50年代初期，政府對知識份子，特別是受過西方教育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強迫他們放棄原有的價值觀念，當時幾乎所有在高校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都被送去「革命大學」洗腦筋。如果說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還僅是新政權試圖以學習的方式，在短時間內強迫他們接受馬列主義的話，那麼1952年進行的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卻從結構和體制上將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根本打散了。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主體是出身清華的留美學生，但在這次院系調整中，清華受的打擊最大。這所有自由精神和獨特學術傳統的綜合大學，被強行改成工科大學，使原來充滿活力的人文環境失去活力，這個群體中的許多知識份子離開了大學而進入了受政府控制的社科院系統。隨著自由流動權利的逐步喪失，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被固定在單位中。同人報刊在很短的時間內消失，使知識份子表達思想的基本方式完全被納入固定的意識形態中。朱光潛本來對自由主義價值觀是很嚮往的，在1947年《觀察》周刊爭論「自由主義往何處去」時，他也參加過論戰，並指出自由主義者不屬於一個政黨，只體現一個中立的超然態度。朱光潛認為，既然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就不應該有組織。因為有組織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紀律，因而難免「黨同伐異」、「阿其所好」，這與自由主義的精神是背離的。他認為任何一個政黨，都不應黨仇視自由份子。他寫到^②：

1952年進行的高等院校院系調整，直接從結構和體制上將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根本打散了，這個群體中的許多知識份子離開了大學而進入了受政府控制的社科院系統，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被固定在單位中。

我敢說在30年乃至50年的未來，中國真正的民意還要藉社會上少數優秀自由份子去形成、去表現。假使這一部分人被逼得終歸於沒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正是這位朱光潛，在1949年後，作為北京大學西語系的主任，很快就發現自己不適於作領導工作，多次向校務委員會主任湯用彤辭職。但這也逃不過很快到來的知識份子改造運動。在這次運動中，朱光潛依然成為北京大學的重點批判對象。後來朱光潛認真研究過馬列，並在1951年翻譯出版了路易·哈拉普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探討藝術問題的《藝術的社會根源》^④。按說朱光潛該是一位被改造過的學者，但在1980年以後，朱光潛首次著文為沈從文鳴不平^⑤，並對自己在《西方美學史》中不敢提叔本華和尼采表示強烈自責，認為「這是由於我的顧慮、膽怯、不誠實」^⑥。由朱光潛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高壓下的心態。馮友蘭、金岳霖、賀麟等相當一批西南聯大知識份子都有相似的經歷。50年代初，他們都曾努力否定自己的過去，以適應新的環境，但最終都未能免於被批判的命運。晚年又都對當年的自我否定表示反省。金岳霖晚年曾說：「在解放前，我沒有搞過甚麼政治，那時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後是不是失去這個自知之明呢……。」^⑦話雖婉轉，但不難感到對自我否定的反省。

由批判電影《武訓傳》到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最終目標指向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大規模的批判胡適在思想文化領域裏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鬥爭中，試圖將西方的影響掃除乾淨，同時構造知識份子「原罪」論的神話，讓知識份子從靈魂深處否定自己過去所受的教育。1957年反右運動的到來，終於導致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徹底衰落。在這次運動中，中國民主同盟從中央到各地的主要負責人幾乎無一倖免，而民盟又與西南聯大有較密切的關係。1942年底，民盟宣傳部長羅隆基到昆明建立地方組織，羅隆基和周新民等人將西南聯大許多教授如聞一多、吳晗、潘光旦、費孝通等吸收入民盟。這樣到了1957年，西南聯大知識份子自然也就在劫難逃。毛澤東曾說過：「原本想用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幫助整黨。想不到他們這樣不可靠，最壞是民主同盟，他們是男盜女娼。」^⑧1957年以後，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中被打成右派的比例很高，從此作為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知識份子縮影的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體，再也未能恢復元氣。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中國民主同盟從中央到各地的主要負責人幾乎無一倖免，而與民盟關係密切的西南聯大知識份子也就在劫難逃，他們被打成右派的比例很高。

註釋

① 1955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部委員中出身於西南聯大的有118人，佔學部委員總數473人的24.9%。參閱周發勤等：〈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貢獻〉，《科學學研究》，第8卷，第2期（1990年6月19日），頁22。黃志洵：〈西南聯大與中國自然科學家〉，《百科知識》，1986年第7期，頁70-74。

② 張起鈞：〈西南聯大紀要〉，《學府紀聞：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台灣：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頁13。

③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550。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初稿第五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1613-14。

④⑤⑥ 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清華大學史料選編》（三），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2-3。

- ⑦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徵求意見稿，《簡訊》，第11期（北京，1982），頁9。
- ⑧ 張申府：〈一個呼籲〉，載孟廣涵主編：《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下卷（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頁515。
- ⑨ 蕭超然等：《北京大學校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頁23。
- ⑩⑪ 參閱劉克選：〈30年代清華大學成功原因初探〉，《自然辯證法通訊》，1994年第3期，頁26；29。
- ⑫ 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四）（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636-46。
- ⑬ 《聯大八年》（昆明，1946）。
- ⑭ 《大公報》（天津），1947年1月10日3版。
- ⑮ 陶文釗選編：《費正清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頁311。
- ⑯⑰⑱ 費正清著，陳惠勤等譯：《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頁223；225；226。
- ⑲ 任之恭：《一個華裔物理學家的回憶錄》（太原：山西高教聯合出版社，1992），頁101。
- ⑳ 聯大檔案。轉引自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編著：《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314。
- ㉑㉒ 王浩：〈誰也不怕誰的日子〉，《清華校友通訊》，復18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8），頁66。
- ㉓㉔ 殷海光：〈殷海光遺札〉，載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一（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頁310。
- ㉕ 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頁15。
- ㉖ 謝泳：〈《觀察》撰稿人的命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3年10月號，頁52。
- ㉗ 張東蓀：〈美國對華與中國自處〉一文附記，《觀察》，第2卷，第6期，頁27。
- ㉘ 沈雲龍：〈光華大學雜憶〉，《傳記文學》（台北），第39卷，第3期，頁54。
- ㉙ 林元：〈憶愛國學者陳序經先生〉，載北京大學校友聯絡處編：《笳吹弦誦情彌切》（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頁146。
- ㉚ 孫敦恆：〈張奚若先生生平事略〉，《張奚若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9），頁15。
- ㉛㉜ 《觀察》，第1卷，第6期，頁17。
- ㉝ 朱光潛：〈自由與民主政治〉，《觀察》，第3卷，第19期，頁8。
- ㉞ 常風：〈回憶朱光潛先生〉，《黃河》（太原），1994年第1期，頁163。
- ㉟ 邵華強編：《沈從文研究資料》（上）（廣州：花城出版社，1991），頁379。
- ㊱ 《朱光潛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頁210。
- ㊲ 參閱王中江：《理性與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哲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頁48。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書店，1984），頁156-61。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1993），頁74-75。
- ㊳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頁188。

謝 泳 生於1961年。山西榆次市晉中師專英文專業畢業，現為山西省作家協會研究人員，主要研究中國現當代知識份子問題。